

## 日本帝國主義：後明治觀點

Marius B. Jansen 著

蔡龍保譯

自從日本變成美國學者主要關心的對象，40 年間焦點經過數次的轉移。最初 10 年或 10 幾年，問題集中在 20 世紀日本帝國在東北亞及東南亞擴張的起源與過程。於日本問題研究的第 30 年間，日本戰後的恢復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這些問題是關於日本的穩定與經濟成長的背景問題，因此討論轉向現代化的過程與潛力。此一時期並且特別置焦於國家建構的 19 世紀。最近 10 年許多學者從事多種主題，從長期被忽略的早期、中世日本的研究到當代日本社會的本質。整體而言，注意力已從日本是侵略者與日本是現代化者，轉移到對歷史過程的複雜性與曖昧的承認。紛爭與抗議的模式、日本現代化的反效果方面、後工業社會的弊病，皆開始受到注意。

在此一過程，日本帝國的早期階段並沒有得到一般人所預期的注意。20 世紀中葉的日本帝國已經得到廣泛的注意，其擴張主義的趨力被視為是病態的，而明治政治的推移也已得到更多的注意，但是帝國建構的後明治時期則尚未受到應有的注意。後明治時期的意識型態與保守主義亦是如此。一些研究正從事保守主義與國家強加的限制對文學與政治表現自由的影響，但這些論文也率先挑起帝國與帝國主義的主題。

回顧戰後日人對明治帝國主義起源的討論，顯現出他們是出自指責與

後悔的觀點。作者們指出，日本在其歷史當中從國際環境得利，其鄰邦都是愛好和平的農業主義者，只有當侵略的現代工具可取得時才會以怨報德。在早期，19世紀末帝國主義威脅的國際環境，被用以強調日本帝國擴張的防衛與被動本質——在歐洲染指之前率先佔有對日本的穩定與力量關鍵的地區。此外，東北亞的不穩定——韓國與中國軟弱無能吸引了西歐的侵略者，這也被用來解釋日本領導人何以決定發動擴張。對許多致力於對這些問題的作者而言，其潛在前提是：後明治日本的帝國主義發展是有些脫離常軌，且需要非難或為之辯護。

本文旨在指出，這些問題的提問方式被錯誤地陳述，且導向無益的道歉或控訴。幾乎所有的作者的研究基於此一假設：作為一個亞洲國家，日本在道德上是應該表現他與西方列強不同——西方列強較肆無忌憚，且有不同的種族敏感性。事實上，與上述相左的論點亦同樣重要：在明治時期的政治氣候中，日本有充分的理由走向帝國主義之路，而且這樣的追求並不與日本的傳統或社會思想相違逆。

## 1、19世紀的日本對財富與權力的追求

明治國家的領導人與將來的領導人，看到處於競爭與可能有危險的環境中，建構國力可能發生的問題。明治時期將西方列強視為「貪婪的狼」已無需再重述或引證。在1850年代，日本發現身陷於歐洲列強為非歐洲國家所設計的不平等條約的網絡之中。條約港、固定關稅、最惠國待遇、治外法權等，即為西方為非西方國家謀畫的一套規則，此一模式已被應用於波斯（1836、1857）、土耳其（1838、1861）、暹羅（1855），最重要的是，被運用到中國（1842、1858）。日本國家主義者抨擊這套規則，將之視為對國家主權的汙辱性侵犯。這些條約的修正與廢除之過程（直到1911年明治末期才完成），是日本內政中最迫切、爆炸性的問題。

對西方直接的反抗很快地被視為是無效且危險，只會導向毀滅性的失敗。唯一的選擇是學習西方的技術，而這一並不樂觀的局勢被未來的並駕

齊驅甚至超越的想像所粉飾。同樣的觀點於德川幕府末期不斷地被提出。因此江藤新平，一個佐賀的武士，於 1856 年寫了長篇的備忘錄記錄其由閉關政策轉向開放政策的轉變。他比較了 17 世紀閉關的可行性與當時更為強大的列強。日本是一個島國，在海岸線的防衛上更顯困難。他總結：必須以一長期的計畫去使用人才，不僅是日本的人才，尚包括任何在世界各地可發現的人才。任何在器物、武器、醫藥、土地開發、天文學等可發現的優點，應被用來發展國家的財富與力量。這項政策的成果將能保證日本能擊敗任何敵人，且強大地足以向外擴張。早先西方曾將日本比擬為英國；而今英國既強且富，於世界上擁有許多殖民地，雖然英國較日本小，位處於天後不佳的北緯，其農產亦遠不及日本。英國透過其航海到亞洲的能力而富強，應讓日本同樣發展其航海與貿易，它將會是「真正地成為世界上最強的國家」。總之，學習西方將會為日本帶來良好的成果。西方的強盛更催促了競爭的需求。

帝國主義擴張的大時代在其後 50 年到來，但如後德川志士江藤等已能描繪預想日本的回應和未來的成長與重要性的遠景。1880 年代歐洲列強正在關閉日本在東亞可能的擴張點，外相井上馨的備忘錄即顯示其注意到這點。井上要其同僚注意此一事實：歐洲列強正為亞、非僅存的少數地區而競爭。亞洲國家，除了中國之外，或多或少皆為西方所控制。且這些殖民地不斷地在增加殖民帝國的力量，而藉著通訊、行政的提昇和人口的成長，他們將成為殖民母國更重要的構成物。沒有人會懷疑這將會繼續。井上馨：就我的觀點，我們必須做的是將我們的帝國與人民，轉型為歐洲的帝國與人民。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在亞洲邊緣建立一個新的、歐洲風格的帝國。

這時期的日本國家政策以向列強學習為前提，也包含了擴張的趨力——這是 19 世紀最後幾十年所有現代化國家的明顯特徵。即使在西方，對帝國主義擴張發展批評的聲音相當少，因為帝國主義擴張的道德訴求在於將文明與基督教帶給落後種族。最近的作品指出，在世紀中的幾十年間，英國很少用「帝國主義」、「帝國」等帶有輕蔑含意的詞彙；在 1870 年，「帝國利益」在英國則變成普遍的口號。在世紀末，英國變成帶有自我滿足意

識的、有意識的帝國主義者；藉此英國自比為羅馬帝國，並自詡肩負文明開化的責任。在美國亦是如此，伴隨 1899 年美國決定合併菲律賓而來的爭論，發現神職人員與工業主義者同樣支持合併，聖經的輸出與糖的輸入同為重要的目的。因此，明治人士從何放棄增加領土以建立日本的偉大的想法？即使懷疑者亦必須將合併視為從搖晃中的滿洲解救亞洲人，或從兩班統治中解救韓國人。同樣的，大部分的美國人亦認為其組織機構更勝於西班牙在加勒比海、南太平洋的組織機構。

可以確定的是，世紀的轉換在日本與西方，同樣引起一些爭論性的評論。在英國，Hobson（《帝國主義》1902）由於對波爾戰爭的嫌惡，轉而非難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別是對資本主義者。他控訴大產業主義者與銀行家促成帝國主義者的冒險投機，以圖替剩餘資金提供有利、高獲利的投資。1916 年，Lenin 基於 Hobson 的理論，而將帝國主義者的競爭與戰爭視為獨占資本得實現所不可避免的運作。1901 年，早 Hobson 一年，幸德秋水寫了《帝國主義：20 世紀的亡靈》一書，置焦於帝國主義擴張的非道德性。幸德將日本初始的帝國主義敘述為軍國主義與侵略主義之產物，這種武力與侵略性在自私的人性中最不可取。其標準基於儒家。他主張文明的目的應該是人性的、公平的、正義的，但是國家主義是將人們從封建主義釋放，卻只是使他們進入新的奴役形式。日本政府利用向外發展的光榮的想像，來分散其公民對國內病狀的注意。此一過程的危險，日本較歐洲各國為大，因為日本的民主發展仍然貧弱，採行鎮壓的可能性較大。

然而，這樣的評論是較特殊的。新聞記者德富蘇峰擁有更廣泛的讀者群，早期基督教運動的產物，是暢銷作家及發行量最多的雜誌—《國民之友》的創立者，亦是《國民新聞》的出版者。德富最初是和平主義及議會政治主義的倡導者，並認同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工作。1890 年代中期，他認同達爾文主義在海外的潮流，為了擁護帝國主義而放棄和平主義。他在一封寫給朋友的信中指出其此一轉向與以下事實密切相關：第一，日本國際地位在中日戰後的轉變，第二，全世界的潮流走向帝國主義。1913 年，當他寫《時務一家言》（A Tract for the Time）時，他準備條列出日本由於戰爭與擴張所付出的代價。從 1874 年遠征臺灣到日

俄戰爭，實已付出極大的代價。這不是一連串的光榮勝利，西方列強以三國干涉的方式否定日本在馬關條約的利益，而俄國在 1905 年之後的恢復頗為迅速，以致有些人會認為贏得戰爭的是俄國而非日本。日本的情況實可謂付出極大的代價，使得納稅者承擔可怕的負擔，且尚有更多的負擔正等著他們。然而，德富主張，這只不過是國家偉大的代價與條件。國家所必須做的是在國內採社會民主、在海外採帝國主義。我們國家有二條路可走：獨立或是從屬。第一條路需要帝國主義作為我們的目標，而第二條路，我們則必須準備接受合併的命運。再者，日本的帝國主義並不是基於一時的衝動，它既不是愉快的娛樂，亦不是在開朗的心情下被進行的。它是生於必須，如果我們希望以一個國家存在、以一個種族倖存。

我們對一時期的媒體與一般觀點仍然缺乏充分的調查。但是在明治的最後十年，日本帝國主義的建立似乎是很明白的。日本人明確地準備接受達爾文主義在國際秩序中的選擇與競爭，使得帝國主義擴張成為強健的政治形態。小國家也許無法面對此一競爭，未開發、未現代化的國家也許無智力與之競爭，日本自 1868 年起所追求的公平，無疑地亦屬於此一競賽。日本的擴張似乎與歷史的潮流並列。它與獨裁和民主國所遵循的道路平行。事實上每一個重要的國家皆參與了此一競爭。期望國際行為效法其同儕（指列強）的日本能自帝國主義脫離，是不合理的。

然而，決策者似乎沒有一個單一、持續的計畫。如 Edward Chen 所言：1895 年決定推動臺灣的割讓，是領導人操縱、影響下的產物—伊藤博文決定要求割讓，較其他人所提之大計畫安全、較不重要。合併韓國的決定，是在面對軍部許多全面性的要求下，由伊藤及其從者不斷提出較少的目的下之結果。此一潮流是擴張性、是對外的，但是其時點與表現，是在每一點競爭壓力下的產物。

當我們想到帝國擴張的主要支持者，大概第一個會想到軍部領導人。現代陸軍的建立者—山縣有朋，於 1880 年代末在寫給同僚的備忘錄很明白地表現。這些資料經常被引用與討論，且並沒有要求進一步的說明。山縣以為日本的問題是由俄國與英國敵對的帝國主義所致，兩者皆朝日本前進：俄國人藉由西伯利亞橫貫道路，英國人藉由加拿大橫貫鐵路。日本必

須在兩者間選擇其中之一，因為這兩者確然會發生衝突。他們的利益將在韓國與阿富汗競爭，而這兩國皆無法防衛其自身利益。山縣接著區分日本的統治線（母國）與其利益線（包括韓國）。日本選擇同盟國是考量心中的利益線，此一考量使其傾向與英國連盟以抗俄國，以保護其在韓國的利益。中日戰爭使得日本對南滿的遼東之探查成爲可能。日俄戰爭時，山縣確信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這是唯一可能的擴張地區，也是對付俄國報復的一個緩衝。

日本軍部的領導人是以更爲廣泛的領土觀點解析安全；然而，應該記得的是，無論如何這是從日本軍隊戰勝中國這個事實當中，得到的唯一可能的解析。北岡伸一指出，雖然日本陸軍於戰爭中的勝利是可預見的，但是海軍對於北洋艦隊的全面勝利卻是超出預料，並引起海軍領導人對於安全需求的再評估。海軍大將山本權兵衛試著想改變政府「陸軍第一」的心理傾向與政策，而以「海軍第一」代之，1899年提出的政策聲明：由於日本是倚賴貿易的島國，其作爲一個島國戰略重要性在於日本海軍須有在距離本國極遠的距離攻擊敵人的能力，才能保護日本的運輸船。山本甚至提出驚人的主張：韓國對日本的安全並不是必須的，本國島嶼的防禦是足夠的。雖然陸軍領導人駁斥其論點，但是亦尊重山本，在命令架構下給予海軍更高的地位與責任。即使如此，在日俄戰爭中發現，陸軍對於海軍在對付北韓與樺太時的軍事作戰合作並不滿意。諷刺的是，戰爭的結果對海軍是不利的，因爲其壓倒性的勝利剝奪了它在東北亞的敵人，僅管陸軍有理由擔心俄國的報復。這意味著致力於陸地的力量與戰略，反映於1906年田中義一所描繪而給予山縣的防禦計畫，且於1907年初爲最高司令部所採納。在此一情況下，日本對大陸權利的維持與擴張是犧牲數萬人命與財富而建立，亦是宣告了日本國家政策的第一優先爲何。

至今日本已經發覺其現代化較慢的不利之處，開始稱自身爲處於劣勢的後進國。當對日本人民遭受不公平、不公正而感到悲痛時，日本領導人利用這樣的怨言以確保其他基本利益。後明治領導人以此一技巧實行之，結果得到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德國交戰地政學的代言人－的讚賞。豪斯霍弗寫道：當衡量……日本擴張要因背後的力量，我們必須承認

他們並非發展自當下的需求，而是發展自對遙遠未來的關心。……此一高尚的種族，被保護於極為有利的地理位置，且為其土質與天氣的良好所增長，是較其他一般國家更為嚴厲。

此一發展中的重要角色，深為豪斯霍弗所讚賞的是，受哈佛訓練的外交官小村壽太郎。小村於日本移民難題的初始階段任職於華盛頓，總結說：美國的日本移民，多出自農民、勞工階級，在美國有害於日本的形象。任職於北京使其確信清廷政治的衰弱；1901年，於桂內閣時任外相，變成推動戰爭、定義戰爭目的的主要角色。1905年於樸資茅斯條約中協商。小村回到日本後決定推動對滿洲的國際控制或進入滿洲。

小村的手法特別顯示於日本人移民美國的問題之處理上。明治時期中間的幾十年間，許多商業公司的成立促進日本農民移民夏威夷、美國、甚至東南亞。小村在華盛頓的任內即總結說：移民是不利的外交困難之根源。1909年2月，其任第二次桂內閣外相時的外交政策演說中，小村再向內閣確認：移民的困難僅限於加州，而日本正與美國中央政策接洽。但是無論如何，必須注意的是，日俄戰爭的結果使得帝國的地位改變，屬於其行政範圍內的地區增大；我們應避免將人民散落於他們所迷失的外國。我們應盡可能地指導人民到一個地區，並運用他們的集體力量。因此，在韓國及滿洲日益增長的擴張需求的解決方法，亦是日益嚴重的與美國的外交問題的解答。當然，於同一期間，日本擁擠的島內與不利的地位的討論，開始切中要害，集中於國內外的輿論，因而減輕對領土悄悄擴張的反應。

## 2、紛爭的可能來源

我已經斷言：日本走向帝國主義，是其了解世界潮流後合乎邏輯的回應。在許多方面，這樣的理解是正確的。如果此一問題是以這種方式表達，則去問誰反對後明治日本的帝國主義擴張之路，將會較去問誰主張後明治日本的帝國主義擴張之路適切。

明治幾十年間並不太允許沿著這些線路作研究。明治最初10年間狹

隘的武士階級，對於這樣的探查當然不抱希望。我們不應該太重視後德川時期的諸多擴張計畫，因為我們不太能從進步計畫與明治 40 年或其後計畫的實施間，找到關聯。德川時期的擴張主義者是對長期閉關自守的反應，且他們不太可能會被要求施行其建議。在很大的程度上，他們只是要正當化其開國貿易之建議，並證明其愛國主義不應被質疑。在其他層面上，一個未發達的國民感（an underdeveloped sense of nationality）也許與過度發達的領土特殊主義相連結，而使得韓國或北京僅是較江戶些微的遙遠與陌生。我懷疑這樣的情感，最好應將之視為過分的修詞而摒棄之。

這些考察擴張到明治時期最初 10 年的語言表現。主張懲罰韓國與台灣住民的武士階級，正表現出長期被封閉、欲邁向偉大與行動的熱望，由於德川後期的言語表現中所燃起的希望並未實現，所以其擁護的急迫性更大。就地區性集中的觀點視之，擴張主義者或韓國的狂熱，在西南地區的人士最多，他們在維新政治中亦居領導地位。這些地區的武士（對倒幕貢獻很大），有其最大的希望是想成為征韓論的先驅者。亦有一個階級緊迫性的成分；一些征韓論的支持者將之視為懷抱失望的忠誠武士的暫時性緩和手段。

1880 年代是民權運動的年代，但是大體而言，在自由民權派的領導者當中，對於擴張主義者的政策之反對，並無較之前 10 年武士的不滿為多。當然，這兩個團體間實際上是有重複的。此一新運動的社會基礎，較之原來只是要求對韓國侮辱的懲處，更為廣泛、其數量更大、更為成熟。一些自由主義領導人—中江兆民、植木枝盛—並無排外主義者的言語表現，且我們不需要懷疑，他們所控制的外交政策將是十分不同的。但是從一開始，自由主義領導者發現，要求強勢外交是他們挑戰政府的最佳武器之一。條約修正的提出，中斷了 1880 年的政治語言表現。一些自由主義者建議在韓國行獨立的改革努力，樂觀地以為韓國的成功將會引起日本的政治改革。教育家、報紙的經營者—福澤諭吉，透過其學生致力於影響韓國的改革，但是這些企圖隨著 1882 與 1884 年的意外而失敗，他則以其經常被引用的論說—脫亞論撤回其努力。對於無能力或不願意回應的亞洲，日本似乎無力加速並影響其改革，他總結：與亞洲鄰國的進一步關係將阻

擬日本自身確保與西方平等的尊嚴與努力。此時唯一的政策是對待亞洲如同西方對待亞洲一般。

自由主義者與政黨要求強力而明確的對亞外交政策，這在 1890 年實行明治憲法後的內閣有得到回響。早期的內閣發現自身為國會議員們所困，他們非難來自西方的侮辱、抗拒條約中不受限制的外人居住權，對於中國在 1890 年代宰制韓國，亦要求有所行動。中日戰爭似乎在內閣頗受歡迎，因此有一些歷史學家推測此一可能性：戰爭代表伊藤首相與陸奧外相政府以有意的技術性策略解決其問題。當然，接下來的幾年間，由於準備與俄國抗爭的需要，經常透過立法使預算充足。1895 年中國割讓遼東給日本是富爭議的，唯一的意義是在俄、德、法「三國干涉」後，取消遼東的割讓。這是日本仍未與西方列強平等的新證據，這可以充分合理化，在犧牲國內利益的情況下，軍事擴張下的一連串的新犧牲者。很明顯的，要求卓越的同時，自然必須要有擴張與犧牲；對一個政府而言，要他們減速是較要他們加速更為困難。

明治日本的宗教團體對於反帝國主義者的領導並不抱持希望。當然，不是神道。透過對統治者的禮拜而為國家所用的國家神道，能將日本完美統治的擴張，向鄰國描述為寬大的行為。國家神道的國家角色亦使得日本帝國統治異常地高壓而令人窒息。明治時期的佛教，長時間自早年反佛的神道偏見中恢復，並傾向於強調其國籍與愛國主義，以別於基督教（佛教將之視為主要問題）。至少在一些情況下，佛教是為明治國家服務，致力於擴張日本在中國的影響力。在 1890 年代的明治時期，基督教被攻擊為非愛國的、親外國的。1891 年內村鑑三拒絕禮敬教育敕語，其對 1895 年奪取中國領土的不悅，及其於日俄戰爭時期的和平主義立場等，結合起來使其成為反帝國主義擴張的領導代言人。但內村僅不過是一個孤立的聲音，因為基督教領導人對於政治關心是傾向於採取非常小心的立場。因此，反對日本擴張，在明治宗教的成員中，僅限於孤立的聲音。再者，隨著日本在臺灣、韓國建立宗主權，明治的宗教團體可從現代化的聖職當中找到機會，這正是吸引美國神職人員到菲律賓傳教的原因。在某個程度上，韓國是一個例外，因為基督教在美國的保護下有一堅實的基礎；因此，

基督教扮演國家主義的角色以挑戰日人的努力，憤恨的韓國人民對神道在韓國的努力，感到特別地不愉快。

隨著明治憲法下帝國內閣的建立，我們也許會預期中產階級的民主支持者對於帝國主義潮流會有批判性的討論，但是並非如此。隨著 1895 年馬關條約內容的公開，其中要中國割讓土地的條款引起貴族院議員、土佐藩士谷干城的批評，但並非來自下院的批評。相反的：當代西方民主國家的帝國主義潮流，得到明治、大正早期中產階級民主發言者的支持。

其中一個有影響力的代言人是浮田和民（1859-1945）。他在 1902 年為《國民新聞》所寫的一連串文章當中，《帝國主義と教育》（1901）與《論理的帝國主義》（1909）當中，浮田將帝國主義敘述為時代的潮流。它已為俄國、英國、德國、美國所採用，它似乎變成 20 世紀的中心思想。他接著說：帝國主義應被視為建立國家力量的優先方式。事實上，它是達爾文自然選擇與進步原則無可避免的運作。浮田決不是軍國主義者或國家力量的理想主義者。他同德富為 1876 年學生基督教 Janes 的熊本團之創立委員之一；而後繼續就讀於同志社與耶魯大學，其於 1909 年任太陽雜誌的主編之前曾任教於同志社與早稻田，在其職業生涯中，堅持其作為卓越的基督教徒、學術分析者及立憲政府的支持者之立場。浮田堅持，在帝國主義中，選擇是可能的，就如同它在現代化中一般；而日本應該避免德式軍事帝國主義（也許是命定的），並將其工作視為開化海外、使母國更為國際化的工作之一。他以立憲政治聚集帝國主義者的欲望，並將立憲政治視為增進人民參與政府的必要設置，視帝國主義為增進國際化與參與海外的相關手段。他的目的是工業及貨物的帝國主義，雖然他承認低開發民族反抗的實例，對日本而言也許需要使用武力才能扮演在該地區發展的角色。當然，太陽雜誌的執筆者強調對立憲政府的支持，也可能傾向支持強力的外交政策。「國內行立憲政府，海外行帝國主義！」被用於 1905 年國民俱樂部抗議樸資茅斯和平條約的宣言中。

被預期可能反對的一個團體是明治社會中許多的「亞洲優先者」(Asia firsters)。這些人所分布的社會地位與重要性，從私人活動者如宮崎兄弟，到公爵近衛篤磨（其位於明治官廳的頂端）。有此一信念的人們，盡其生

命與精力以矯正他們國家的既定政策－西化與西方導向的「歐洲第一政策」。他們主張日本的未來在於亞洲，日本藉由文化傳統、語言、種族而與其亞洲鄰國關係密切，且可預期在西方最終將無基地，因為西方日益為激烈的種族差別待遇所困擾，且愈來愈害怕黃禍。特別是日本與中國，在條約港階段皆為西方帝國主義的目標，應合作努力抵抗西方的威脅。

宮崎兄弟（民藏、彌藏，特別是滔天[寅藏]）以其人性向善的理想主義、民主及社會改革，經歷過自由主義運動。生於九州熊本縣的地主家庭，他們深刻了解在明治通用鑄幣稅條例（provisions for a regular monetized tax）下的佃農之艱苦。他們將人類飢餓的問題與亞洲的改革問題、獨立問題相連結，並主張中國的問題是解決亞洲問題的中心，事實上亦是解決全人類問題的中心。最後，這兩個弟弟決定尋求一個能推翻舊有的並能解決其社會、政治問題的英雄。以此一方式，發生在中國的革命同樣將加速日本的改革。宮崎滔天（虎藏、寅藏，1871-1922）的自傳是充滿激情與真誠的展現。他決定潛入中國社會並與其「英雄」緊密共事，他試著透過韓國、暹羅（於該地他領導一群農業移民）、菲律賓（在該地亞昆諾杜（Aguinaldo）正在抵抗美國新領主）而接近中國，且最後為孫文服務，他以其餘生致力於孫文的理想。

宮崎與他的一些同志批評、不信任日本的帝國主義，但是他們對於日本的帝國主義的發展並無提出一成功的批評。因為他們的激情與窮困，他們偶爾會受到社會上、政治上較優越者的歡迎，幫助他們的計畫，並作為他們的連繫。在他們的團體中若沒有這樣的幫助，他們將是十分無力的，除非他們是在來自中國的避難客之補助下工作。他們從其國人利己的、不誠實的語言表現中作了一個受歡迎的改變。但是他們從未成為環繞著他們的、較強勢的帝國主義潮流的重要反對力量。他們甚至傾向於將其國家的政策錯誤與西方帝國主義者的政策錯誤間作一區分。

總之：在明治社會當中，只有在極少的、真正的社會革命與評論者當中（如幸德秋水與內村鑑三於社會民主與基督教運動的外緣），才能發現對明治日本所遵循之帝國主義進程的真實且徹底批評。另一方面，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及大正民主期到來之後，國際時勢轉變，日本自由意識隨之

轉變。因此，吉野造作（教師與評論）與其前輩浮田和民，對帝國主義所採的態度有很大的不同。帝國主義於國際背景中需要一個改變以造成日本的改變。然而實際上，明治日本的帝國主義是在沒有挑戰下發展。

### 3、一些觀察

我已經提出說，日本的帝國主義可解釋為對同時代國際範例的回應，其行為與政策是模仿世界的領先國家，在國內觀點與傳統當中，反對這樣的回應是較少的。在許多方面，日本邁向殖民控制的動力可說是完全合理的方式，因為在該時代世界的大部分及大部分的亞洲似乎為列強所瓜分的情況下，日本為了確保其安全。日本對於必要資源的來源是不確定的，希望確定食物供給與原料的來源，以圖在任何條件下能在世界市場上競爭。隨著西方帝國主義自戰後的亞洲消失，促使日本帝國主義發展以作為部分解決之道的問題也消失，日本渴望成為區域強權的慾望亦隨之消散。這當中許多可被述為完全合乎邏輯的，但是日本帝國主義亦有其特殊性。

其中之一是：日本的擴張主義作為對國際背景與環境機會的回應，並非是有意、充分計劃的。然而，一些位居高位者亦有例外：如小村壽太郎、後藤新平等政府領導者。日本是回應危機與機會多於試著創造機會。因此，大概可以說帝國主義從未變成國家自覺的重要部分。日本沒有 Kipling（英國的小說家、詩人），很少有對於日本領主身份的普遍神祕感，只有相當少的國家自我滿足。殖民地官員從未變成國家官僚的重要角色；它很少是重要人物發展的起點，而 1930 年代進入軍事擴張期的韓國，則將之完全自殖民地官員行政體系中撤出。在日本，帝國的結終引起極少的傷害與悔恨。事實上，它很少被討論。在此也許會與美國作一比較，因為美國的帝國主義時期，同日本一樣皆為半世紀，並可能與英國作一對照。日本人同美國人一樣（不像英國人），不往回看。

日本的帝國控制是獨一無二的，因為日本本身也是亞洲國家，其一開始亦同其鄰國處於不利的地位。它試圖要加入外國壓迫者的行列，最初在

韓國，而後在中國，最後進入帝國主義者的陣營。即使如此，在整個過程當中，日本作者與領導人持續談論日本與其鄰國的友愛關係。這導致一種充滿矛盾的模式，這些矛盾核心存在於戰後日本對帝國主義過程的討論的道德上的憤慨語調。針對中國而喊出的同文同種的口號並不能使中國人更加接受日人的政策的要旨。關於與韓國歷史連結的強烈陳述與每日新聞沾沾自喜的社論相悖。當要併吞韓國時社論言：「只有當所有的國家到達同樣的文明層次時才有世界和平。低文明國家是不容存在的」。神道國家主義的特質，使日本能謊稱與韓國有兄弟之情。然而，日本開始將完全同化的堅持與韓國國家的實質消滅作結合。韓國的統治階級為日本的統治階級所吸收，日人的統治溫和地擴張，如父親般地使一個民族宣稱其為日人。1942年韓國正式被宣布為日本不可缺的一部分，而其行政則由殖民地轉向母國。韓語教育在較低等的學校被廢除，韓國歷史的研究亦被禁止。國家神道被強制實行於韓國人，韓國人甚而被要求將姓改為日語念法。行政力量仍然壓倒性地為日人所把持；在較高的階層，約占80%。這也造成以下的事實：安重根於1919年刺殺了日本統監伊藤博文，隨即變成後獨立民族英雄（*post-independent national hero*），並於伊藤之前的居住地為之立雕像紀念之。一個國家的民族英雄是由於其刺殺了鄰國的民族英雄，這種情況大概很少吧。矛盾即存在於亞洲帝國主義之中，亞洲的帝國主義自認為是設計來保護日本的亞洲鄰國免於西方的帝國主義，其於整個太平洋戰爭中持續存在，並反映在一些日本知識份子的推論當中，他們為戰爭尋求意義—終結亞洲歷史中的西方時代。他們的記述於1982年較1941年更為可信，雖然此一可信度是基於日本以及西方帝國主義的結束。

關於此一圖象的另一個不同點是母國與殖民地的差異。在許多方面，是殖民地控制給予殖民地鮮明的國家認同感；母國愈現代化、愈開發，則不論其願不願意，其地位會進升到較高的地位。然而，在韓國，日本人占據一塊土地，其自私感、國家認同、疆界及歷史，完全如其自身擁有般地建立。它並不需要藉由殖民地行政使之統一、使該區成為一個國家，然而，日本當局要創造出傾向日本及日本文化的重要階級，在最好的條件下，也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我們思考帝國與殖民地是典型的距離與數目的混合物。一般而言，距離使得許多投機客無法到殖民地去，大部分的情況是如此，很少鼓勵歐洲人這麼做（除了管理階級）。殖民地人口密集，且常常氣候惡劣，歐洲工人與商店經營者很少有機會在那裡過較好的生活。但是日本殖民地很近；所有各階級的日本人皆可去，數量龐大。他們在許多層面可以競爭；殖民地官員鼓勵農業殖民與行政指導，因此日人建立一個超乎尋常的占據強度。韓國是最好的例子，從土地所有的形式到商業、行政。1930 年代一個警察對 1,150 個韓國人；若包含憲兵，則數字達一個警察對 400 個韓國人。這同樣也在日韓關係留下足跡。

一個進一步的觀點，日本的帝國擴張開始於其工業成長之前，此問題過於複雜而於此無法詳述。日本的擴張，絕不能以列寧主義的陳述方法簡化看待，解釋為其獨占資本擴張的結果。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工業成長是伴隨著帝國擴張，並從中獲利，且同日本的策畫者一樣，視殖民地為其經濟穩定的要因。在連續的各階段中，殖民地代表米、糖的食物來源，非高價商品的市場，製造活動的海外希望與媒介地。在沒有政治競爭或控制之下的開放商業世界中，這些利益是可以達成的，然而卻製造了日本極為不同的帝國主義方式。

總之，雖然日本的領土擴張對日本而言，帶來了短暫的穩定和利益，卻很快地導致日本自身體系的毀滅性的攻防戰，產生的政策促使外國關閉對日本之門，日本遂轉而鼓勵更為侵略性的政策。日本帝國變成東北亞的不安定因素，及日本政治的不安定力量。戰後日本的政策執行的平順及其成長，是歸功於分裂主張與利益的缺席，這些是 20 世紀帝國所生的。最後，諷刺的是，「emperor」一詞因為被視為是 1930 年統治下不合時宜的翻譯，為帝國政府所放棄，然而，在日本帝國名實俱亡的幾十年後，現在仍為日本政府所用。

[譯自 Marius B. Jansen, “*Japanese Imperialism: Late Meiji Perspectives*” in Myers, Ramon H., ed.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1895-194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61-79.]